就新编档案史料谈谈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几点浅见

程　啸　　朱金甫

一九七六年以来，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状态起伏不平。大体上讲，一九八〇年前后，史学界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突破。然而，从一九八四年起，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却稍显沉寂，报刊上的有关论文明显减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主要是发生在北方数省，它的斗争的复盖面较窄，而运动的时间又比较短促。因此，当这场运动的基本过程和某些主要规律得到较深入的阐述之后，人们就势必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开拓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新局面，把这一研究再提高一步、深入一步。探索需要时间，需要对历史现象的更深沉的反思。当前，人们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就正处在一个怎样选择研究方向和扩大研究范围的思考过程中。

近几年来，我们参加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一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对今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形成了几点不成熟的想法，现在提出来以求教于读者。

历史上任何一次巨大的事变，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变动。义和团运动处在清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它骤起急落而变动剧烈，把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化，集中地浓缩在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上。如果我们对这个历史的横断面作多方面的考察，就不仅可以把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清末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为此，我们似可进行下列的这些研究工作。

一、通过义和团运动研究近代的社会结构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甲午战争之后极度激化和深化的民族矛盾，是这场运动迸发的基本原因。然而，为什么拳民运动在迸发时会有那样特殊的表现形态，则目前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很深入的。对于这场运动的独特的风貌，除了从义和团组织形式的自身（即近年不少论者所注重的义和团源流问题）作探讨之外，还可以发掘得更深一些，可以从当时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总体上，来寻找这种特殊的斗争形态的根源。

比如讲，象义和团这类自发的、分散的、依托于集镇和村落结构的组织，居然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于直鲁地区到处勃起，迅速形成狂风烈火的规模，就是一种很值得从各个角度来加以研究的社会历史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就为我们考察清代的国家政权同它的基础——封建性的村落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研究环境。

新编档案史料收集了清季封建国家政权各级机构的有关文书档案。这些史料大体上反映了清王朝统治结构的全貌。以封建皇帝为权力顶端，经过中央政府各部到省道府州县，形成了一套塔形的权力网络，等级严格的官僚体系、完备的封建律例、严密的档案制度，保证了清朝最高当局的意志从中央到州县而得以层层贯彻。这套高度集权的盘根错节的权力结构，从

表面上看是颇为健全和牢固的。

然而，这个庞大的统治体系并没有一直延伸到社会底层。在广大农村，封建统治者借以贯彻其政治意图的行政组织是保甲和团练——以保甲征收钱粮，办团练筹备防务。乡保、团首等乡村在职人员不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他们更多的是受到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所左右。这些人成分复杂、更换频繁，由他们所组成的这种衔接封建国家政权和自然村落之间的行政机构，远不及各级上层政权那样稳定和牢固。

新编档案史料反映出在拳民运动的兴起阶段，山东的基层行政组织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这类组织很不健全。例如在鲁西南的曹县一带，从捻军起事到甲午战后，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团防。于是，在“海疆不靖”、社会动荡的1896年，民间的大刀会就代团练而起。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由秘密结社分子传播和操纵的组织，首先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其二，即使有保甲团练的地方，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这类机构也会产生出对封建国家政权的离心性。山东是戊戌年清廷最早谕令办团的几个省分之一。这条谕令的本意，当然是为了维护地方政权的稳固，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扼制反教会风潮。在对付农民的抗官暴动上，团练历来是清朝军队的得力帮凶。然而，受当时民族危机所支配，带有群众性的团练一旦普遍建立，却又往往自发地超越了封建当局所划定的轨道。当时山东各地的团练是五花八门的，有官团、私团，也有打着团练旗号的拳会和刀社。这种农村习武组织大发展的形势，又为游荡在社会上的拳师、术士、秘密结社分子等提供了绝好的活动机会。这些人适应乡民“沿师习技”的要求进入村社，“附入民团”。他们打着政府办团的谕令另搞一套，“奉旨驱德人、灭洋教”的流言四处蠭起。清朝政府的政策在社会基层产生了变形，民间团体的“自卫身家”就发展为对教会势力的主动进攻。

可见，义和团坛和自然村落相结合的表现形态，同当时社会结构的关系密切。在通常情况下，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村处于彼此隔绝、自我封闭的状态。封建国家政权在表面上的强大和稳固，正是同它统治下的自然村的分散与软弱相比较而体现的。但是，遇到某些特定的环境，如甲午之后民族矛盾支配一切的环境，那些平日很松散、闭塞的村落组织，基于悠久的民族传统、一致的反侵略利益以及共同的社会心理情境，就产生了村落内部各阶层的凝聚力和村落之间广泛的横向联系。村落之间互相感染，彼此模仿，使义和神团飞快地传播开来。这种组织在某一个村落点上并不显眼，但它们相激相荡，就形成封建当局所无法控制的巨大势力。因此，我们考察义和团组织的起源，有助于进一步去认识近代的乡土中国。

二、通过义和团运动研究晚清的政治格局

近几年来，有些学者对清朝政府及其某些代表人物同义和团的关系作了有成效的研究。我们认为，还可以把这种研究再扩大一步，即从这里开始进而去研究清朝统治体系的本身，研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派别、阶层和势力，以及他们之间力量的消长、关系的变动，从而更好地从总体上去把握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荡滌而形成的清末政局。

比如说，清末封建王朝的大权是怎样旁落的，就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清朝当局在镇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某些地方实力派集团的势力逐渐扩张，而尤以义和团运动中的事态更为明显。在义和团运动中那种社会矛盾错综交织的背景下，清廷的各派势力政见杂陈，斗争激烈，最高当局的谕令失去了其惯常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于是就造成了各地方督抚的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局面，特别是为江南几个著名的洋务派官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实力的时机。据端方档案记载，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自己的坐探派驻北

京，由这个坐探将各种情报，诸如中外关系、官员任免、朝野舆论、内廷秘闻等等，源源密电总督衙门。凡朝廷的重大决策，张之洞、刘坤一等都要经过频繁磋商，并且往往是经过盛宣怀的参与意见，才作出反应。端方档案的电档簿里，张之洞与江南官僚之间电文来往之数量，超过了他同军机处的联系。这些电文所反映的内容，固然说明刘、张等督抚力图缓和清廷的困境，但他们的政策措施，又是以维护各自辖区的统治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业已自成政治格局。

与洋务派督抚的实力发展成对比，是以满州贵族为主体的封建顽固派迅速衰微。戊戌年到庚子年，封建顽固派始而勾联某些洋务官僚击败了维新派，继而又企图利用义和团的“灭洋”情绪压倒洋务派而独掌朝政。然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徐桐、载勋、刚毅等顽固派的核心人物丧生，载漪发配并失去爵位世袭权，溥儁出宫交宗室“严加管束”，所谓庚子死难大臣的后代被提补起用。短短几年政治风云的变幻，使封建顽固派从权力的高峰跌到失势的边缘。这股势力从此彻底堕落。如果说，这个集团以往在顽固地抵制一切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反侵略的愿望，那么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他们对外屈从的程度，则超过了洋务派官僚。象刘绅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固然是拳民运动的凶恶的敌人，但他们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交涉中，还力图保持本辖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半独立的地位。这些官僚的妥协外交，还没有走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地步。国际帝国主义之所以在当时没有瓜分中国，虽然与拳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英勇斗争有很大关系，但也要看到，由于以满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已经彻底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因而使侵略者得以通过各自的势力范围而达到了无形瓜分的目的。这样，中国人民对清王朝的一切期望都破灭了。十九世纪末风行于社会上的两个口号——上层资产阶级的保清变法和下层民众的“扶清灭洋”，都迅速地转换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排满”。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是用拳民们击毙了多少洋兵、烧毁了多少教堂来衡量的。这场运动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清末政局的急剧变动。因此，深入地研究义和团运动，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迅速复灭，以及考察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都是有意义的。

三、通过义和团运动研究下层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意识

义和团运动不如太平天国运动壮阔，不如戊戌维新先进，更不如辛亥革命深刻。然而，如果把义和团运动和近代延绵了几十年的民众反教会斗争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史上也许没有一个运动，象前者那样在下层社会深入人心。太平天国的主要意识特征——天父上主皇上帝主宰下的均平理想，随着天京悲剧消失在战火里。维新志士脱离民众，他们在普通人民中留下的是一种模糊的、被歪曲了的形象。即使象辛亥年间爆发的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在农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而反教会斗争及义和团运动则不同。它们那些素朴的、没有经过思想家加工过的口号、歌谣和揭帖，在多少年以后还能被乡野父老们朗朗背诵。那些鼓动反教会的荒诞离奇的流言，如洋教剜眼剖心、井中下药等等，不胫而走，在广大地区几乎为家喻户晓。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教会斗争与义和团运动，共同组成了一场典型的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意识的运动。

新编档案史料为我们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素材。这些材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冲突，而且也反映了中外思想文化撞击的更广阔的画面，比如基督教文化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基督教新教派所传播的某些西学与华北农村中的乡土迷信的冲突等等。在中国下层人民没有获得先进的

反侵略的思想武器之前，正义的反侵略斗争，往往以保卫传统文化和笼统排斥外来事物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一场错综复杂的冲突，既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民族特质或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许多优点，如反抗传统、献身精神、经磨耐劫的活力，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各种糟粕及其在中国民众心灵里形成的沉重的压抑。

当前，伴随着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沉反省，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而研究传统的思想文化，除了着重剖析反映在历代思想家著作中的意识形态体系之外，也应该把民众意识列为对象。因为不论思想家们立场的差异与自觉的程度如何，社会底层亿万人在各个特定时代的意愿、理想、情绪和风尚，终究是他们的各种理论学说的第一手源泉。而他们的理论学说之实现与否及实现的程度，又是以能否适应民众的心理变动、满足民众的社会要求为转移。因此，研究晚清的思想文化史，似应在研究各著名思想家的同时也对常人常事描述，把当时的普通民众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政治要求等等属于低层次、浅思维的因素，作为孕育一代风流人物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思想土壤，给以应有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察反教会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正是我们研究晚清平民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总之，我们认为，要把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一方面是要扩大研究的领域，从研究义和团运动诸问题进而去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及其相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另方面要改进研究的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把社会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有效的方法，充实到历史学的研究中去。这样做，将会通过研究义和团运动史，更深刻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民俗，理解昨日中国与今日中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发挥这一专题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

（上接29页）

㉔ 一史馆藏，录副，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成宁折。
㉕ 一史馆藏，录副，嘉庆十二年六月初一日，马慧裕折。
㉖ 一史馆藏，内阁黄册，山西巡抚成宁造报嘉庆十二年份正杂盐课钱粮黄册。
㉗ 一史馆藏，录副，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禄康折。
㉘ 一史馆藏，朱批，嘉庆十一年五月二十日，英和折。
㉙ 一史馆藏，录副，嘉庆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庆桂折。
㉚ 一史馆藏，朱批，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成宁折。
㉛ 一史馆藏，录副，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禄康折。
㉜ 一史馆藏，录副，嘉庆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禄康折。
㉝ 《沿革史》P.108。
㉞ 《沿革史》P.69—70。
㉟ 《光绪会典事例》卷224，又见《备览》卷五。
㊱ 《沿革史》P.72。
㊲ 《沿革史》P.71。
㊳ 《沿革史》P.73。
㊴ 《备览》卷一，盐池门。
㊵ 《备览》卷六，奏疏门。
㊶ 《沿革史》P.72。
㊷ 《沿革史》P.70。
㊸ 《沿革史》P.72。